

第三章 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

1912年到192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大转型、新思想大爆发，政治局势之多变、新旧文化之冲突前所未有的，媒体类型、新闻业务发展迅速。

民元《临时约法》颁布，媒体勃兴。政党政治兴盛，“政党报纸”一时蜂起。但是，随着党争乱象的蓬生，“政党报纸”很快堕落。

袁世凯当政后，中国新闻界出现了一个“正义报挨整、御用报受宠、奴才报发财”的荒唐局面。一方面，在袁氏专制下，报刊上的言论动辄得咎；另一方面，在传播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复苏的带动下，中国报刊从以政论为本位转向以新闻为主导，开启了中国报纸的新闻时代。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再造共和，表面行宪，媒体生存环境略有松动，但国内外形势依旧严峻，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守旧势力强大，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造中国文化实现民族振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己任的新报刊纷纷创办，由此形成的新报刊阵线出现在中国新闻界。报刊数量平稳增长，1921年全国有报刊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1924年，日报发展到628种。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及其媒体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传播与实践的机会。这一时期，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成熟的职业在中国发展起来，民营报纸开始走向现代化，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等纷纷诞生，中国报人的职业素养也渐趋成熟。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封建帝制走向终结。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政治巨变引发了思想、教育、新闻等诸多领域的变革。

一、民元《约法》与新闻传媒的勃兴

民国元年，报纸繁荣一时。据统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报纸由10

年前的100多家陡增至500多家，总销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均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仅1912年2月后的几个月内，到北京民政部门登记要求创办的报纸就达到90多家，报业繁荣一时。

报纸大发展得益于民国成立后法律制度的变化和言论自由意识的增强。

第一，旧禁令废除。武昌起义后，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报律》等限制办报的法律条规完全被废除。

第二，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法规在中国初现。南京临时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尝试建立起与西方民主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1912年3月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载入其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才能“依法律限制之”。^①同时颁布了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了新闻事业的繁荣。

第三，革命党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推动。民国成立后，取得胜利的革命党立刻在其所控制的部分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理念，建立起保护支持新闻言论自由的机制。部分政权机关也在所颁布的法令和签署的协定中，写有保护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内容。

二、“暂行报律”与对新闻自由的认识

这时期发生的“暂行报律”事件，让言论自由观念更加深入人心。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等人，鉴于《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的状况，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了一个简略的法令“暂行报律”：“（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②

这个简单的“暂行报律”3月4日颁布后，立即遭到新闻界的反对。7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出章太炎撰写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对“暂行报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912年3月6日。

律”三条逐一加以批驳，且言辞极为尖锐。应该说，革命成功初期，颁布这样的法令对阻止国内外反动势力通过新闻舆论力量反对新政权，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内务部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无权颁发这样的法律文件，并且“暂行报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及量刑标准含混不清，在实施中易被误解与滥用。于是，孙中山从制定法律的严肃性和保护新闻自由的立场出发，于3月9日下令取消该报律。孙中山的做法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各种报界团体依照新闻自由原则曾多次代表报界，就报律存废、报人权益等问题与政府进行交涉。

不过，民初报人一味强调言论自由，却没有意识到报人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那时，国人与报界对报刊和报人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和自诩。新创办的报刊，无一不以天生的“舆论之母”“舆论的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极力宣扬在民主制度下，“报馆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院均同为监督公仆之机关”“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等观念，致使报刊不仅根据道听途说批评官员，甚至对总统、总理、内阁成员等进行人身攻击，形成无序之自由。一些知识分子过于迷信报刊的力量，政客也热衷于操纵报刊。

三、“政党报纸”的蜂起与消亡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为适应“议会政治”需要，各政治集团纷纷组建政党。据不完全统计，民初各种党派有312个。为给竞选制造舆论，各政党又纷纷创办报刊，“政党报纸”一时蜂起。

“政党报纸”绝大部分属于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政党系统。国民党是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型政党组建而成，由于资格老，其报刊体系较大，遍布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河南、安徽等全国重要省市，主要有上海的《民立报》《天铎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北京的《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天津的《民意报》《国风报》等。其中上海《民立报》是总机关报。“二次革命”失败后，该报受到袁世凯迫害，于1913年9月4日停刊。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对袁世凯、黎元洪进行过抵制和斗争，表现出一定的民主精神。后来，由于党内矛盾激化、思想蜕变，部分报纸的革命调子逐渐降低。进步党于1913年5月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而成，以梁启超、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等为领袖，其报刊活动也遍布各地，足以与国民党

系统报刊相抗衡。主要报纸有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大共和日报》，北京的《国民公报》《少年中国》，天津的《庸言》等。这些报纸一时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临时政府和民主共和。除了这两大政党系统的报刊外，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和党人也办起不少报刊。

“政党报纸”出于一党之利，对国内外一切与己不利的思想主张进行毫无原则的激烈争论，彼此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直至互揭老底、相互谩骂，甚至武斗。这种现象在报史上称为“政党报纸的堕落”。

总之，民初的“政党报纸”虽然数量大，但基础薄弱，内部运作混乱，随着政局的变化迅即破灭。以“政党报纸”为主体的民初报刊“繁荣”，也只维持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第二节 报刊“新闻时代”的开启

一、袁世凯专制下报界的灾难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当政之初，为争取舆论支持，做出一些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如在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接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颁发有利于新闻传播的法令，实施对新闻专电的优惠政策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业的发展。然而，袁世凯一旦站稳脚跟，很快以“国情复杂”为由放弃尊重新闻自由的做法，对新闻媒体进行钳制和摧残。

1912年12月15日，袁世凯政府颁布《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内，驻军司令官有权停止结社集会以及禁限被认为“与时局有妨害”之报纸杂志广告图书等出版物。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以清除报界“败类杂种”等理由，以比前清报律“稍严”为主旨，制定与颁布了《报纸条例》。该法令35条，增添了很多新的禁限措施，在执行中又层层加码，不断增益。同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改变了《临时约法》规定的只有在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等特殊情况下方可对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予以法律限制的基本精神，使该项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予以法律限制。12月5日，袁世凯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共23条，将禁限规定推广到所有的文字、图画印刷品等出版

物，内容更为苛刻。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修正报纸条例》，进一步控制言论出版自由。

除制定颁布法律外，袁世凯还通过以下手段利用、控制并摧残媒体。

第一，创办御用报纸。袁世凯掌控的御用报纸中，影响较大有《亚细亚日报》和《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在北京创刊，袁世凯政府出资10万元，由薛大可出面创办并担任主编，日出三大张，是御用报纸的领头羊，发布言论和社会活动最为卖力。“二次革命”期间，该报发表反对孙中山革命党的《讨贼露布》，鼓吹复辟帝制，积极宣传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后，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该报记者称自己为“臣记者”。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在上海出分版，遭到革命党人强烈抵制，报馆接连两次被炸。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亚细亚日报》也随之终结。1915年袁氏还强行接办声誉良好的革命报刊《神州日报》，利用它原来的威信鼓吹帝制，欺骗民众。

第二，收买报纸或报人。袁世凯还根据不同需要，分长期发放津贴和一次性收买等方式收买舆论，不惜金钱。据不完全统计，有125家以上报纸接受过袁世凯的贿赂或收买。由于滥发津贴，还催生了一些“鬼报纸”和“马路小报”。这些报社没有固定社址，内容东拼西凑，编辑全仗“剪刀、糨糊、红水笔”，甚至有的在现成的版面上换一个报名和社评，临时印出几十份，以应付“津贴”发放者或是讨要“津贴”。

第三，迫害和摧残反对派报刊。“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对革命党报刊毫不留情地封杀与摧残。捣毁、查封报馆，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6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报刊减少，报馆被毁，报人被捕被害，新闻界遭受浩劫。1913年是中国农历癸丑年，新闻界的这次浩劫被称为“癸丑报灾”。

袁世凯政权的高压，也引起社会和报界部分人士反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东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这两份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接着，孙中山领导海外其他地区创办革命报刊，或将当地的华侨报刊改组为革命报刊，建立起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阵地。中华革命党志士随后潜回上海租界等地，创办反袁报刊。1916年1月22日，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创办《民国日

报》，成为革命党在国内的宣传阵地。袁世凯宣布筹备帝制后，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呼声中，原先一时拥袁、亲袁的报纸和报人也转变立场，加入了反袁行列。著名报人梁启超写下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杂志发表，之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老牌资产阶级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

二、“王旗变幻”下报纸的发展与转型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去。袁世凯死后，中央集权力量被削弱，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权力更迭局面。“军阀们所造的国家混乱和不统一局面，为思想多样化和对传统观念的攻击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军阀，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大学、期刊、出版业和中国知识界的其他组织。”^①中国迎来了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高潮，这一高潮与政治军事上的混乱局面并存，客观上为新闻业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之初，为笼络人心，表面上恢复约法，尊重舆论，宣布取消袁世凯统治时期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一些政令，并先后解除对《时事新报》等多家报刊的禁令。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基本上仍旧依托既有的一些法律如《出版法》等对新闻出版业进行管理。一些新出台的条例或规定，也开始被援用。虽然这些条例规定十分苛细，但也为报界争取新闻自由提供了一些依据。再者，当时负责新闻出版管理事务的内务部警政司第四科在部内地位低下、力量薄弱，使报刊自由发展有机可乘，不仅原有报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还有一批新报刊创办起来。据统计，到1916年底，全国新老报纸达289种，比1915年增加了8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进步，使报纸广告和发行收入有所增加，打下报业良性发展的经济基础；世界上先进的轮转印刷机被引入中国，使报刊增加印数加大发行量成为可能；加之一些商业报人出于“避祸”考虑，尽量少发或不发容易

^① [美]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惹祸的政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闻采集渠道，新闻取代政论成为报刊的主体内容。

三、职业新闻记者群的崛起

此时中国报纸转型发展，与职业新闻记者群体崛起密不可分。中国新闻记者，最初称访员。1893年7月《申报》出现了“记者”一词，20世纪初该词大量出现，然而，访员称谓一直用至清末。北洋政府时期，随着报纸向新闻时代转型，访员逐渐改称记者，记者制度由此普及。不仅外国新闻机构在中国派驻记者，一些有实力的中国报馆也在全国各地派驻记者，采集新闻信息。一批以采写新闻通讯著称的记者活跃在中国新闻舞台上，著名的有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

黄远生（1885—1915），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21岁中进士，后又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但他无意为官，对记者职业却很青睐。1912年黄远生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了记者生涯。其后参与多家杂志的撰稿，担任《时报》《申报》《东方日报》《亚细亚日报》的特约记者，撰写大量政治通讯。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留下大量关于社会重大事件的记录，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之奇才”。袁称帝时，想借重他在舆论界的声望为其张目，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黄远生坚辞不就，由北京避到上海，公开表示在国体问题上“与贵报主义不合”，并避走到美国。1915年12月25日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误杀，年仅31岁。其通讯评论作品后辑为《远生遗著》4卷存世。

黄远生是我国第一个因新闻采访和通讯写作而闻名的新闻记者，在实践中，他奠定了现代新闻通讯文体的基础，其采写的通讯被称为“远生通讯”。

“远生通讯”有以下一些特点：其一，题材重大，内容翔实。他的新闻通讯涉及的大都是重大政治新闻，或是人们欲知而不得知的内幕新闻。他经常出入政府要害部门，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访难访之新闻，取独家之报道。其二，分析深刻，见解独到。黄远生在新闻通讯写作上，对新闻背景、事件内幕的挖掘与分析入木三分。其三，文笔生动，亦庄亦谐。他的通讯大多涉及政坛人士，对他们的描绘生动形象，于诙谐中透出犀利。其代表作《外交部之厨

子》，从一个余姓厨子的个人经历，写出世态的复杂、官场的腐败和革命的不彻底等。总之，黄远生的通讯既继承中国古代文史作品微言大义、真实生动的优良传统，又具备现代通讯的基本特点，集真实性、新闻性、生动性、评论性于一体，对后世影响深远。

黄远生正式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四年的光景，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新闻理论，但也有一些理念散见于作品之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报纸应“主持公理，指斥时弊”。第二，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第三，记者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基本功训练，做到四能：“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① 这既是黄远生对记者的要求，也是他自身经验的总结。因而，黄远生被称为“四能记者”。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振青，字飘萍，浙江金华人（图3-1）。13岁中秀才，1902年入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在杭州与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编。后因抨击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和卖国罪行被捕；经营救出狱，逃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1915年底，他返回上海，应邀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主笔，抨击袁世凯称帝。袁倒台后，邵接受《申报》聘请，担任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1916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



图3-1 邵飘萍

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1919年因触怒段祺瑞政府，报纸被查封，邵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应聘《朝日新闻》工作。1920年下半年，段下台后，邵回北京恢复《京报》。1924年前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因反对张作霖，被定罪“宣传赤化”遭奉系军阀杀害。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同时代的张季鸾曾评价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

^① 黄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第12卷第11期。

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还说，“中国有报纸 52 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邵飘萍”。^①邵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随时处于“临战状态”，新闻触觉灵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德断交的重大新闻线索，就是他不经意间听到一个电话得来的。另外，广泛交游，随机应变，掌握对方心理，把握战机，都是他获得独家新闻的重要技巧和手段。他从事新闻工作 14 年，采写了许多重大新闻，具有代表性的有金佛郎案、府院之争等。

同遭奉系军阀杀害的记者还有林白水。林白水（1874—1926），福建闽侯人，曾留学日本，1901 年开始投身报业。林早年倾向革命，袁世凯当政后任总统府秘书兼直隶省督军署秘书长，袁世凯倒台后又被委任参议院参政，1917 年起开始专注于办报。他的文章，“或臧否时事，或月旦人物，夹叙夹议，文采飞扬，谈笑从容，庄谐杂出”^②，他的文风个性鲜明，敢于发声，“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③。林白水办报期间屡因揭露当权者黑幕而被捕入狱，1926 年因文章抨击讽刺军阀张宗昌幕僚被捕杀。

民初名记者还有徐凌霄、刘少少等。徐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黄远生出走后，徐凌霄到北京接替做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他不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还擅写小说、京剧剧评。他文学修养高，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

刘少少，人称“怪杰”，原名鼎和，早年留学日本，1909 年回国后即投身报业，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他撰写政论，鼓吹宪政，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武昌起义后活跃于湖南报界。袁世凯当政后，刘少少著万言书，斥责袁世凯内欺清室，外诳民党，卑劣非人。刘少少与黄远生、徐凌霄一道被称为“民初三大名记者”。

民初职业记者群体的诞生既是中国记者职业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报业

^① 《京报特刊》1929 年 4 月 24 日。

^② 林伟功主编：《林白水文集》，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 2006 年刊行，序一，第 1 页。

^③ 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发展成熟的开始，显示出报业作为一种行业或职业的魅力。

第三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报刊新阵线

中华民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二十一条”，加紧对华侵略。国内政治混乱不堪、民不聊生，帝制两度短暂复辟；思想文化界，康有为等清末改良派开历史倒车，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等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这种局面引起中国新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索，他们从文化角度入手，欲以思想文化变革作为社会改革的开端。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国民思想和文化的启蒙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上半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早期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领域迅速向政治领域扩展。1919年“巴黎和会”在西方列强操作下，拒绝中国代表的合理要求，与日本勾结，继续牺牲中国利益。消息传来，中国人民尤其是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学生出离愤怒，掀起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在新文化运动滋养下，在五四运动推动下，中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报刊新阵线。

一、陈独秀、李大钊的办报活动

（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展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考中秀才，后转向寻求西方新学，自1901年起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同时，他还在国内外组织进步团体和报刊书社。清末协助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担任编辑，与人合作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并任主编。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月刊，在报刊上发表时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志气，鼓励克服“奴隶根性”。1915年夏，袁世凯复辟帝制，陈独秀毅然回国筹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作为改造国民、开展思想革命的舆论阵地（图3-2）。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店印刷发行。该杂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



图 3-2 《新青年》

一阶段（1915年9月—1920年5月），杂志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进行猛烈攻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这一阶段又分为陈独秀独立编辑时期（1915年9月—1917年12月）和北京大学教授轮值主编时期（1918年1月—1920年5月）。^① 第二阶段为共产主义刊物时期（1920年下半年—1926年终刊），^② 此阶段专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为发刊词，在中国思想混乱时期，竖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青年提出“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六项要求和期待，但因曲高和寡，《新青年》出版不久即停刊。1916年段祺瑞上台，康有为大力鼓吹尊孔复古，提出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在这股

① 1917年初，陈独秀受蔡元培之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到北京大学，次年1月第4卷1号开始改为同人刊物，实行轮值主编制，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

② 《新青年》从1920年9月第8卷第1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6号休刊，前后共出54号。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改为季刊，作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继续在广州出版，至1926年7月终刊。

逆流思潮面前，陈独秀恢复出版《新青年》，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谬论，《新青年》先后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吴虞的《打倒孔家店》等一系列政论文章，指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鲁迅、李大钊等也发表文章反对尊孔复辟。

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新青年》利用科学观点反对封建迷信，痛斥所谓“灵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偶像破坏论》、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等文，进行无神论宣传，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尖锐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

第三，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言之有物的平民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无病呻吟、陈腐铺张的贵族文学。随着胡、陈文章的发表，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许多进步人士积极响应，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具有独特风格的白话文学作品，彰显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新青年》成为全国推进白话文的重要阵地。

（二）李大钊运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在《新青年》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①等，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②，坚定地认为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 1919年，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撰写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把读者的眼光引导到这一伟大的革命学说上来，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新阶段。

① Bolshevism，即布尔什维主义。

② 《新纪元》，《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③ 《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页。

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提倡民主、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刊物纷纷创办，许多联系实际、提倡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刊物应运而生。

（三）《每周评论》创办及其对五四运动的宣传报道

《新青年》进入北京大学后成为理论刊物，“重在阐明学理”，出版周期相对较长，无法指陈时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决定创办一份周刊，“重在批评事实”。1918年12月22日，4开4版的《每周评论》在北京诞生。《每周评论》的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是一份以评述时事、发表政论为主的政治时事评论周报，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共出37期。第1至25期由陈独秀主编，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第26至37期由胡适主编，转向实证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每周评论》内容丰富，议论精辟，栏目多样，辟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等12类。这些栏目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具有强烈的时事政治性。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给予大力支持，发挥积极的舆论先导作用。从5月11日第21期起，接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刊载关于群众运动的详细报道，发表支持群众正义斗争的评论，迅速传播中国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

《每周评论》是中国新闻期刊性媒体的前驱，所产生的巨大舆论宣传作用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效仿。随后，孙中山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梁启超1919年9月在北京创办半月刊《解放与改造》，毛泽东1919年7月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等。

二、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办报活动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五四运动的强大推动，一批进步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9年一年内就达400种之多。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出版的《新潮》杂志、北京学生救国会出版的《国民》杂志、瞿秋白等编辑的《新社会》旬刊、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和恽代英主编的武汉《学生周刊》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其中的代表。

《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于长沙，是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毛泽东主编。它是一份小型的宣传新思潮的时事政治性周刊，以“研究、传播新思潮”为宗旨，重点评论国内外大事，全部使用白话文。毛泽东撰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曾连续刊载在《湘江评论》第2、3、4期上，反映了他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该文曾被许多报刊转载、推荐，是一篇具有全国影响的历史文献。该刊第1期印行4000份，从第2期起增印5000份，除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上旬，该刊第5期正付印时，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武力查封。《湘江评论》与《每周评论》《星期评论》齐名，被称为五四时期“三大评论”。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一份大型报纸，周恩来主编。该报初期日出对开一大张，主要发行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平时日销4000余份，最高日销达万份以上。出版仅两个多月，9月22日就被反动当局查封。经过斗争于10月7日复刊，改出三日刊，直至1920年初停刊，共出100多期。该报在领导天津学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读者称赞该报是天津的“新曙光”，评价它是“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三、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闻变革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有一系列的变革，这些变革既适应社会变化，又促进社会改革。

（一）自由讨论风气的出现与政论的发展

报刊自由讨论风气的形成。在《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报刊倡导下，报刊冲破封建统治桎梏，提倡科学，推动思想解放，使社会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它们把形形色色的观点展现在人们面前，相互映衬，互为补充，形成思想交锋和论战的风气。

政论传统的恢复与“述评”体裁的发展。五四时期自由讨论之风兴起，也带来政论的恢复与繁荣。各家报刊广泛采用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多种形式发表论说，打破袁世凯当政时期报刊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常用“述评”和“时评”形式来评论国内大事，夹叙夹议、思想深刻、针对性强，在舆论引导方面效果显著。

（二）新文风的倡导与推广

报刊开始使用白话文。晚清时期，曾出现过少量白话报刊，影响不大。总的来看，新文化运动之前，文言文是我国知识界通用语体。《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后，身体力行，逐渐用白话文写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报业，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作出历史贡献。

新式标点符号的推广。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新青年》还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公布《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规范、统一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后来，许多报刊也都相继采用这套新式标点符号。

（三）新闻业务的改进

为获取重要新闻，一些有实力的报馆开始重视国际新闻采访，他们聘设特派记者，增辟国内外新闻来源，促使新闻记者群体迅速扩大。巴黎和会期间，胡政之等中国记者亲临现场，发回大量报道。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筹经费，向美、英、法、德、俄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开辟国外新闻来源。其中派往俄国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3人，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在《益世报》上连续发表56篇旅欧通讯，深刻反映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旅欧华人的斗争和中国留学生的艰苦生活，为这一时期的国际新闻通讯增添了光彩。

报纸版面编排在这一时期也有大的改进。首先，头版头条突破原有标准，原先的“大总统令”已被最新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所取代。其次，版面分栏多样、专栏增多且有新意，报刊出现各种时事述评专栏，还有“要闻”“社论”“随感录”“新文艺”“通信”“译丛”“国内劳动状况”“新刊批评”等比较新鲜的栏目。再次，版面行款改革。这一时期，钱玄同首次提倡汉字竖写改为横写、报刊竖排改为横排。《新青年》对其部分内容进行横排尝试，并在文章分段、每段起头空两格、横行排版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报刊版面豁然醒目，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对后来版面编排影响深远。

在报刊文体创新方面，除政论文恢复和创新外，新闻通讯大放异彩。为了及时报道爱国群众运动，出现了一种“小通讯”，既尊重新闻性，又适当地运用一些文学手法。

（四）报纸副刊的革新

清末以来，中国报纸副刊基本以“报屁股”自限，作为供人消遣的“雅兴

园地”，文化品位不高。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为报纸副刊带来革命性变化，既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内容上的变化，更是副刊在价值观念上的一次飞跃与转变。许多报纸副刊改变以前低级趣味的风格，变成介绍新思想新知识新文艺、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传播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四大副刊”，即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的《京报副刊》。在它们的影响下，各地报纸副刊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报刊的诞生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共产主义刊物出现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已开始创办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新闻事业和指导自己的新闻实践。这期间共产国际等组织也派人来华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创建政党和创办刊物，他们不仅传授创建政党的经验，也传授国际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办报经验。同时，赴苏采访的瞿秋白，到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以及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等人，在参与国际无产阶级报刊实践中，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新闻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带回到中国。随着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开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出现了最早的共产主义刊物。

（一）《新青年》改组

中国最早出现的共产主义刊物是改组后的《新青年》。

陈独秀 1919 年 6 月 11 日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出 9 月 16 日获释。获释后的陈独秀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务，回上海前决定将《新青年》迁到上海。12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上发表《本志宣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宣布抛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新青年》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开始。

1919 年 6 月 3 日爆发的“六三”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政治罢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后陈独秀开始研究劳工问题。1920 年 2 月，他秘密离

开北京来到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当年5月，《新青年》出版的第7卷第6号成为“劳动节纪念号”，上面刊载陈独秀写的《劳动者底觉悟》和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还以大量篇幅反映各地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情况。“劳动节纪念号”的出版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里程碑，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与无产者接近，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从而也促使《新青年》的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向最终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迈进一大步。

在共产国际代表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于1920年7月正式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这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机关刊物。这一期《新青年》发表陈独秀《谈政治》一文，表示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这一期起，《新青年》还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有关苏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材料，介绍苏俄政府各种政策，表明《新青年》的转变基本完成，由宣传新文化的启蒙刊物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

（二）《共产党》月刊创办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1920年11月7日创办的半公开理论性机关刊物，是中国第一个有影响的共产主义刊物，由李达^①主编。该刊至1921年7月止，共出6期。《共产党》月刊大力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论述中国革命道路和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策略，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该刊第一次在中国竖起“共产党”的大旗，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阐明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并进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初步探讨。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各地共产党筹备组织尝试性地出版多种面向大众、启发觉悟的通俗读物。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1920年8月创办的《劳动界》，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11月创办的《劳动音》，中国共产党广东早期组织10月创办的《劳动者》。这些刊物虽然理论粗浅、刊行时间不长、影响不大，但伴随着它们的出版，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传

^① 李达（1890—1966），中共“一大”代表，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

播，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在理论上得以确立。

二、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创办

（一）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新闻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宣传工作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每个组织均有权出版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① 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后，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第6期起迁北京出版。1926年奉系军阀进京后，加紧迫害共产党，《向导》又先后迁至广州、武汉等地。《向导》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共产国际，当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参与过该刊编辑工作。蔡和森是第一任主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赵世炎等是主要撰稿人。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离职，由当时中宣部主任彭述之兼任主编；1927年4月，由中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兼任主编。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向导》被迫停刊，共出版201期。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规出版的机关刊物，《向导》历经了国共合作从建立到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该刊一直秉承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严格按照党的纪律组织宣传活动。创办之初，《向导》集中宣传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向导》便把统一战线政策作为宣传重点。为了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向导》反复阐明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关门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性，促成国共合作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后，继续大力宣传统一战线思想。

《向导》最初发行量1000份左右，后逐渐上升，增加到每期2000份，到1926年为5万份，武汉时期，最高发行量达到10万份。读者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②的唯一报刊，把《向导》看作“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③。1925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② 《读者之声》，《向导》第176期。

③ 雅零：《安福政府查禁本报的反响：雅零致向导报记者》，《向导》第104期。

年1月，中共“四大”高度评价《向导》：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①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1918年同毛泽东等人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在法国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回到上海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文章能抓住重要的现实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勤于写作，以忘我之精神投入到党的宣传工作中，在其担任《向导》主编两年八个月期间，为该刊写作五六十万字。

（二）恽代英、萧楚女与《中国青年》

中国共产党报刊创办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报刊也创办起来。中国共产党先有中央机关报，后有地方党组织机关报，而青年团是先有地方组织机关报，后办中央机关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报刊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15日创办的《先驱》半月刊。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先驱》改组为团中央第一个机关报，邓中夏任主编。该刊每期4开4版，前后出版25期，1923年8月15日停刊。两个月后，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上海另行出版新的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恽代英、萧楚女先后任主编，林育南、邓中夏、任弼时、李求实、张太雷等参加过编辑工作。1927年10月被迫停刊。该刊以青年为对象，以“为革命的青年做革命的指导”为宗旨，关心青年切身利益，结合青年思想特点，回答和解决当时青年和青年运动中遇到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寻求正确答案。该刊积极配合《向导》等中共党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评论，并特别注意与各种反动思想做斗争，以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增强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宣传家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页。

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后参加五四运动，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同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向往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后来《晨报》《时事新报》选派驻外记者时，他被派往苏俄。在苏俄两年时间里（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采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还出版了著名通讯报告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瞿秋白的作品真实深刻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了解，在青年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瞿秋白于1922年2月在苏俄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回国后，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是中共早期新闻事业的缔造者，先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热血日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等。1934年2月到中央苏区就任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并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因病留在江西坚持斗争，次年在转移途中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瞿秋白几乎参加了1935年之前中共创办的所有重要刊物的工作。他所主编的刊物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15日在广州出版，共5期，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为基本任务。其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介绍马列主义有关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出版共产国际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等专号；二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主张；三是参加“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发表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批评唯心主义观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前锋》，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假托在广州出版，原定为月刊，实际未能按期出版，共出版3期。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它重视调查研究，采用大量统计数字，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热血日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6月4日）创办，铅印4开，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国际要闻”“舆论之制裁”等栏目和副刊《呼声》。它发表大量新闻和评论，

及时报道上海工商界群众的斗争，评述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传播国际进步势力支持中国人民的信息。它同《向导》周报相配合，特别在时效性上弥补了《向导》的不足，对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起到指导作用。《热血日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出版10天后，日销量就达到3万份，每日收到来稿来信数以百计。6月27日，出版第24期后被迫停刊。

第五节 新闻传播的职业化

一、民营报纸的企业化发展与现代化管理

（一）民营报业的企业化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短暂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北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条例、法令，使得中国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成为当时流行话语。爱国热情、提倡国货、振兴实业三者交融，成为一种潮流，财政、金融、工矿、交通、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民营报纸企业化进程。

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一批老牌商业报纸发展非常迅速。《申报》全部股权1909年被华人经理席子佩购买，这张著名大报从此回归国人手中。1912年春，史量才、张謇、陈陶遗、应季中、赵竹均五人又从席子佩手中购下《申报》产权，合股经营，张謇任董事长，史量才任社长。其后，经过一场诉讼风波，^①其他股东退出，史量才独资经营，继续走企业化道路，几年后大有起色，无论是发行量还是盈利，大大超过美查经营时期。《新闻报》在汪汉溪父子精心经营下稳步发展。进入20年代后，两报进入新的发展期，销数急剧上升：《申报》1921年销数为4.5万份，至1926年底，达14.1万份；《新闻报》1921年销数近5万份，1923年达10万份，到1926年达14.1万余份，接近该报历史最高水平（15万份）。

这一时期，上海还有一批商业性报纸获得较大发展。其中突出的是《时

^① 1912年史量才等人以12万元向席子佩购买《申报》产权，1915年，席子佩因产权交割履行中的细节问题，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会审公廨判新主人败诉，赔偿前主人24.5万元，否则，报纸仍归前主人所有。其他合股人纷纷退出，史量才设法凑足偿银，保住报纸。

报》《时事新报》。它们与《申报》《新闻报》一道被称为当时上海的“四大报”。

在北京，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报系”也步入企业化发展轨道。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勳，又名成平，笔名舍我，原籍湖南湘乡，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任校对、助理编辑，在北京《益世报》任编辑、总编辑。他于1924年4月16日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10日创办《世界日报》，同年10月1日出版单张《世界画报》，在业务上走特色发展道路。《世界晚报》标榜“主张公正，消息灵确”；《世界日报》以军事政治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世界画报》先以时事照片为主，后以美术作品为主。注重办副刊，聘名人担任主编，努力提升质量；日报副刊《明珠》，晚报副刊《夜光》，均由张恨水主编，刊登文学名家作品。成舍我还重视经营管理，节约成本，加强内部管理，把印刷、发行、广告等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世界日报》日销量达3.5万多份，居当时北京各报之首位。

北京企业性报纸发展较好的还有邵飘萍主持的《京报》与林白水主持的《社会日报》等。

在天津，《大公报》连续出版。1916年9月，创办于清末、以“敢言”著称的《大公报》，由原股东之一王郅隆盘购，聘胡政之为经理兼总编辑。王郅隆对胡政之完全信任，胡政之对《大公报》尽心尽力。1917年1月3日，胡政之在《大公报》上发表元旦寄语《本报之新希望》，表明他决心继承发扬该报光荣传统：“本报之历史，一奋斗之历史也……窃不自量其绵薄，欲举吾报奋斗之历史而广大之，以应时世之潮流，以求长足之进步。”的确，在胡政之全权操办下，《大公报》不仅继承了英敛之时期爱国立场和敢言传统，追求“以言论报国，为民众代言”，对国家内政外交大事发表独到深刻的言论，而且在版面革新、新闻记事方面也有不俗表现和卓越建树。尤其是1919年，《大公报》开辟“巴黎专电”“巴黎和平会议之通信”专栏，刊登胡政之从巴黎发回的“专电”“通信”，系统详尽报道巴黎和会消息。1920年8月12日，王郅隆宣布与《大公报》脱离关系，退出股本，将股权交给其子王景珩。同日，胡政之也刊登启事，“将大公报主笔兼经理职务概行辞退”。此后，《大公报》内部“派系”纷争日益严重，加之管理混乱，营业年年亏损，难以为继，于1925年11月27日停刊。

《大公报》停刊9个月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伙组成“新记

公司”，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买下该报全部资产，于1926年9月1日续刊，史称新记《大公报》。

吴鼎昌（1884—1950），字达诠，笔名前溪，四川成都人，1901年获官费赴日本留学，1910年学成回国沉浮于财政两界。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四川成都人，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1911年学成回国，做了一段短时期的律师工作后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编辑、经理均在行，尤以管理见称。张季鸾（1888—1941），名焯章，原籍陕西榆林，出生于山东邹平，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从事新闻工作。他文史功底扎实，笔头硬，文章写得很漂亮。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作复活《大公报》时，都已年届不惑，且“投身报业率十余年”。尤其是张季鸾、胡政之经过在新闻界十余年的挣扎奋斗，得到的多为办党派报刊失败的教训，因而在接办《大公报》后，提出所谓“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强调报纸的独立性，对报馆实行企业化管理，使这家一度破产的报纸续刊后获得成功，很快从天津走向华北乃至全国，一跃成为极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

20年代天津地区比较有名的企业性报纸还有《益世报》等。

（二）报业现代化管理

民营报纸发展，得益于现代管理。清末民初，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方式逐渐在中国流行，从资金来源、机构设置到内部管理方面，将现代化管理机制运用在包括报业在内的各行业中，加速了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当然，与其他行业一样，报业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也带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痕迹。

第一，股份制经营方式得到确立与发展。1872年第一家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采用股份制创办，为中国近代自办股份制企业之始。该局主管唐廷枢主持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国人自办报纸《汇报》。在他提议下，该报也采用了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为中国股份报业之首。后来，上海《字林西报》《文汇报》《新闻报》等在20世纪初均改组为有限公司。《申报》在1889年美查回国前夕也完成公司转型，由个人经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史量才收购后，迈入现代化建设之路。新记《大公报》是一个资金股和劳力股综合的股份制企业，吴鼎昌出资5万元，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组成新记公司经营《大公报》。

第二，资金来源渠道拓展，有个人投资、独立机构投资等。民国建立后，

一些报人依然靠个人投资创办报纸，但这些人的目的多不在政治，而在报纸本身，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报人。如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主要靠自己积攒下来的200元大洋起步；董显光办报，也是靠多年积攒下的2000元大洋。不过，由于个人积累不丰，个人投资资金少、后续资金短缺，很容易在报纸还没有立足时就被迫停刊，这是中国民营报纸的短板。独立机构即非党派机构投资，同样是民国初期报刊资金重要来源。比如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启动资金5万元，就是吴鼎昌从“四行储蓄会”的“经济研究经费”中列支的。

第三，专业化的报馆组织结构出现。报馆组织结构，即报社内部机构设置和职能分配，这是衡量新闻业专业性与职业化的重要方面。到20世纪初，报馆机构逐渐完善，建立了符合现代报馆经营的营业部、编辑部与印刷部三大主体结构。

报馆人事安排，一般来说最高为总经理，负责协调整个报馆编辑、经营、印刷三方面工作。其次为编辑部的总编辑或总主笔，然后是编辑长，也叫理事编辑。编辑长是编辑部最繁忙的职务，指挥馆员，考核访员。编辑长之下有要闻编辑、地方编辑、特派员、驻国内或国外的特约通讯员以及驻外埠的专职或兼职访员，还有翻译、校对和译电人员。

第四，企业人事、福利制度渐趋系统和完善。《新闻报》对员工请假、奖惩、福利待遇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新记《大公报》对老员工赠送劳力股，除年资加薪外，还有退职赡养金、子女教育补助费、婚丧补助费、医药补助费等。《申报》除了专门的考勤办法外，还制定了如《本馆同事婚丧喜庆送礼简约》之类的规定，对同事及其家人的婚丧嫁娶送礼提出“切忌靡费”的倡议。可见，以上大报馆比较重视企业内部文化建设。

二、通讯社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中国最早的通讯社是1871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根据前一年哈瓦斯社、沃尔夫社和路透社三大通讯社签订的划分报道范围的协定，远东地区归路透社所有。此后，路透社一度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报道。

国人最早创办的通讯社是1904年广州骆侠挺创办的“中兴通讯社”，主要向广州、香港两地报刊发稿。之后又有几家规模不大的通讯社出现。由于当时中国报业并不发达，通讯社从人员到技术都十分落后，所以直到民国成立前，

中国通讯社事业一直不发达。

国人最早在海外创办的通讯社是远东通讯社，1908年由清朝政府驻比利时使馆随员王慕陶、王侃叔创办，得到清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的赞助，接受清朝政府外交部津贴，在国内一些大城市聘有通讯员。该通讯社主要向欧洲各国提供中国通讯，同时也将欧洲重要消息向国内各大报社发稿。该通讯社的设立，向国际传播了中国国内的真实情况，取得国际舆论支持，客观上也协助了中国的外交事宜。清政府被推翻后，该社停止活动。

民国初年，通讯社数量逐渐增多，但仅有极少数通讯社业务比较突出。如邵飘萍主办的东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东京通讯社是邵飘萍于1915年7月在日本留学期间创建的，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它曾首先向国内读者披露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商议中的“二十一条”详细内容，对国内反袁斗争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闻编译社由邵飘萍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以消息迅捷闻名，每天晚上发稿一次，内容有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的外电两部分，每日总有一两篇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

进入20世纪20年代，通讯社有了较大发展，数量有所提升，出现了影响较大的通讯社。据戈公振统计，到1926年，全国共有通讯社155家，北京最多，武汉次之，其中较重要的是1921年成立的国闻通讯社和1924年成立的申时电讯社。

国闻通讯社，1921年9月由胡政之创办于上海，是20年代较有影响的民营通讯社，北京、汉口、天津等处皆有分社。1924年8月3日《国闻周报》创办，评述国内外大事。1936年4月1日，《大公报》在津、沪两地同时出版，国闻通讯社人员充实了两社编辑采访力量。国闻通讯社至1936年停办，《国闻周报》出至1937年12月停刊。

申时电讯社，1924年初设于上海，1928年正式成立，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创办，是20年代较有影响的民营通讯社。初办时主要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编辑记者在工作余暇将所得中外电讯摘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1928年该社进行改组，厘定章程、扩充资本、扩大规模、重新组织，另聘专职人员，分别编发中、英文电讯，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

1924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中央社”曾派出随军记者，逐日报道有关北伐的军事消息。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5月“中央社”由广州迁往南京，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

中国共产党通讯社事业创始于中共成立前，主要是为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人民革命和工人运动，最早的是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华俄通讯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人民通讯社（1921年在湖北）、劳动通讯社（1923年在北京）、国民通讯社（1925年在上海）等。

三、无线电广播的出现

1923年1月23日，美国记者奥斯邦联合一名日本华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大陆报》合作办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XRO，发射功率50瓦。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无线广播电台。内容有英文《大陆报》提供的国内外新闻、娱乐节目，周日播出宗教节目。该台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因此很快被取缔，当年4月停止播音。这家广播电台存在时间虽短，但在上海听众中引起了一阵“无线电热”，不少外商纷纷仿效，开办广播电台。此阶段外商创办广播电台的目的是为推销收音机和其他无线电产品，这些无线电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都不大。

广播电台的发展，使得上海收音机销售量激增。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24年8月公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共23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规定。《规则》允许民间装设收音机，并规定了收音机天线架设范围、收听内容、收音机收费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

1922年张作霖支持设置军用无线电台网络，总部设在哈尔滨，名为东三省无线电台。1923年春，东三省无线电台副台长、我国早期著名无线电工程专家刘瀚在政府支持下，曾在哈尔滨进行过临时广播实验，呼号为XOH，功率为50瓦，用汉语和俄语广播。

中国人建立的第一座国营广播电台是哈尔滨广播电台，刘瀚主持创建。电台于1926年10月1日开始播音，呼号仍为XOH，发射功率100瓦，每天播音两小时，内容有音乐、新闻、演讲、市场信息和物价报告等。1928年1月1日，发射功率增大到1千瓦，呼号改为COHB，亦有汉语、俄语、日语三种语言的广播节目。

与此同时，上海、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几座国人自办的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创办最早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1927年3月18日正式

播音，呼号为 XGX，功率 50 瓦，主要内容是播送商业行情、时事新闻及中国音乐。这座电台虽设备简陋、规模很小，收听范围只限于广播电台所在地区附近，但该台完全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装配、安装及施工，并由国人自己独立经营。电台每天播音 6 个多小时，直至 1941 年 11 月因战乱停办，体现了国人自办广播事业顽强的生命力。

广播电台的兴起开启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新纪元。

四、早期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一）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

随着新闻事业职业化发展，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出现。1918 年 10 月 14 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最先设班系统讲授新闻学课程，为我国新闻教育之嚆矢，亦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己任，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徐宝璜任副会长，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任导师。徐宝璜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意》，后改名《新闻学纲要》）和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国内最早的两本新闻学教材和著作。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青年毛泽东参加了研究会，听课半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直活动到 1920 年 12 月。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我国早期著名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被称为“中国新闻界的开山祖”。《新闻学》成书 14 章、约 6 万字，于 1919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专著，被奉为我国新闻界的“破天荒”之作，对我国新闻学研究影响深远。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注重新闻实践层面的思考，是我国早期难得的指导新闻实践的专著，由北京京报馆于 1923 年出版，为当时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指导。

新闻学研究会还出版了三期《新闻周刊》，为会员提供发表习作的园地，徐宝璜任编辑主任。该刊是我国早期采用横排的刊物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业务刊物。

（二）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20世纪20年代，全国先后有12所大学开设新闻学系科。

首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0年在普通文科中增设报学系（后称新闻系），聘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兼职主持系务，利用晚间授课，选读的学生达四五十人，并出版英文《约大周报》。1924年，美国人武道来华任系主任。该系用英语授课，设有新闻、编校、社论、广告以及新闻原理、新闻史等课程。

1921年，厦门大学设报学系，学生仅1人，1922年增至6人。但1923年发生反对校长的风潮，该系师生离校，报学系停办。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报学系，聘徐宝璜任系主任，邵飘萍等为教授。学制4年，学生除课堂学习外，还去报馆实习，并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创办刊物。

北京燕京大学、北京民国大学等于1924年分别设立报学系。民国大学的报学系创设不久停办。燕京大学报学系（后称新闻系）办学时间长，影响大。起初白瑞华为系主任，蓝序等为教授。学生有专修的，也有选修的，都是三年级或四年级。该系曾设燕京通讯社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香港、东京、纽约等地十多家报纸供稿。

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设立报学系，《申报》协理汪英宾兼任系主任，分设本科和专修科，开设的必修课程主要有报学原理、广告原理和访事学等，聘请《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访事学。该系办有南大通讯社，由学生采集新闻，免费供上海各报刊用。1926年，该校发生反对校长的学潮，报学系停办，大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国民大学报学系由戈公振任系主任，并主讲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主讲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主讲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主讲社论写作。

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于1924年秋开设“新闻学讲座”，由陈望道主持；1926年扩大为新闻学组正式招收学生，由邵力子主持，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

上海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于1926年分别创办报学系，但存在时间都不长。

新闻教育发展的同时，新闻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期间出版的较为知名的新闻学著作10多种，影响较大的除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

际应用新闻学》之外，还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

戈公振（1890—1935），名绍发，江苏东台人，字春筵，号公振。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刻苦学习，酷爱书法绘画；1913年到上海，在《时报》创办人狄楚青创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其艺术天分和勤奋好学精神得到狄楚青赏识，很快被提拔为出版部主任；1914年调到《时报》馆工作，在这里他度过了15年时光，当过校对、助理编辑、本埠版主编，最后担任总编辑。同时，他致力于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系做兼职教师，出版了《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新闻学》等著作，其中《中国报学史》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戈公振在书中首次提出报刊史研究是一门学问，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科地位。他在《绪论》中写道：“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曰‘中国报学史’。”^①他从大量历史典籍和浩如烟海的报刊中收集第一手资料，清晰描绘出从汉唐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刊发展的概貌。《中国报学史》是国人编撰的第一部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报史的著作。

五、报人的职业认同与新闻职业团体的出现

（一）报人的职业认同

职业认同体现出一个行业发展的成熟度。自近代报刊诞生以来，报人和报业的身份认同是渐渐积累起来的。清末报人职业认同度不高，即使如梁启超这样的著名报人，其心亦在“政界”——“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②民国建立后，随着报业尤其是作为职业的报业发展，以及职业记者和新闻教育的出现，中国报人的职业认同度越来越高。

在职业动机上，中国既有以经济利益、商业经营为主的商业报人群体，如《新闻报》《申报》等，也有以政治传播、意见表达为主的党报报人群体。这个时期创办的新报纸，大多能兼顾经济独立、言论自由与社会责任，显示出较为成熟的报业职业性与独立性，如北京《世界日报》《京报》、天津新记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②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5页。

《大公报》《益世报》、上海《商报》等。新报刊的创办人或主笔如邵飘萍、成舍我、胡政之、张季鸾等，其办报和发表的动机即在报刊本身。他们扬弃了以报刊为手段、以政治为目的的清末报人先辈们的做法，是职业认同上的一大进步。

在职业忠诚度上，终身以报刊为职业的人越来越多。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内大学开始实施新闻学高等教育，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才开始在中国新闻界出现。另外一些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也投身报业，其中日本留学生数量比较多，如林白水、邵力子、张季鸾、胡政之、邵飘萍、狄楚青、陈景韩等；也有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专业新闻人才，如董显光、黄宪昭、汪英宾、钱伯涵、陈钦仁、赵敏恒、张倩英（女）等。一些著名报人谢绝其他社会行业的优厚待遇而供职报馆，并愿终身以报为业。

五四时期，中国职业新闻观念渐趋系统和专业化，学理层面不断深入。首先，对报刊的性质认知更具专业特征。戈公振在世界各种报纸定义基础上提出较为全面的理解，“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①邵飘萍也指出，报纸要“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②其次，对报刊功能的认知有专业特色。徐宝璜认为报纸要“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他在《新闻学纲要》中总结了报纸的六大功能，“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③徐宝璜进一步认识到，“公共化”是报纸将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报纸进步的征兆。同时，他强调报纸应成为经济独立的机构，并实现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思想在这一时期深入中国从业者内心。1916年6月20日，上海日报公会电请交通部将袁世凯政府停止邮递的各报纸弛禁，得到同意。同年9月，重庆报界俱进会向当地主管部门呈请，批准反对帝制的重庆三家报纸《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复刊，得到同意。10月，长沙当局也解除了因批评省议员而被禁止到议会旁听的长沙《大公报》的禁令，等等。在强调新闻自由的同时，新闻工作者也不忘提出新闻伦理，强调自身的品性、人格的独立，“倘若一个新闻记者而没有高尚的德性，不能保全尊严的人格，被人利用做人傀儡，有的简直想藉此而求升官发财的捷径，为权势所欲动，为金钱所诱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页。

②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第1页。

③ 徐宝璜：《新闻学纲要》，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5页。

惑，结果必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①此外，个别记者已经意识到保护新闻来源的重要性，提出“不发表约定”，丰富了中国新闻伦理的内涵。

（二）新闻职业团体出现

新闻职业团体的出现，是新闻行业职业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新闻行业队伍形成的重要标志。上海报界于1905年3月13日在《时报》上发表文章，首倡组建报业同业组织。中国最早的报业同业组织是由《大公报》英敛之倡议，于1906年7月1日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当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称：“各报主笔及办事之人，以时齐集，研究报务交换知识之余，诗酒征逐，尔汝欢洽。平生辩难攻击如水火者，握手拍肩，情如兄弟，共话党同之见，而去门户之异……某等近有所感于时局，拟于天津纠集同业，开设俱乐部，以为燕息欢娱地。”北京地区最早的新闻团体是1908年成立的北京报界公会。不过，1909年成立的上海日报公会，因其会章相对完善，组织更为健全，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报业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1910年6月由《上海时报》《神州日报》联合全国43家报馆，在南京发起成立。

到民国初年，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新闻职业团体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以对外交流为目的国际性新闻团体，如1912年11月26日在北京成立的中日记者俱乐部等。此外，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新闻团体也发展较快，1919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报界联合会属于全国性的新闻职业团体；地方性的新闻团体多出现在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

思考题

1. 评析“五四”报刊新阵线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2. 试论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报业的企业化发展及报人的职业认同。
3. 简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与中国共产主义刊物的出现。
4. 蔡和森对《向导》周报的主要贡献有哪些？
5. 简述瞿秋白的新闻活动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的贡献。

^①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9页。

▶ 即测即评

